

翻身农奴迎小康

——记西藏第一个农村基层党支部诞生地克松

新华社记者 罗布次仁 王泽昊

今年79岁的克松社区居民洛桑卓玛，每当走到社区门楼时，总会驻足仰望刻在门楼上那行字——“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·克松”。触景生情，老人的思绪常常被拉回至60多年前。

“旧西藏的克松庄园门口，一年四季都悬挂着一根象征农奴主司法特权的法杖，这代表着克松比其他庄园更加黑暗和残酷。克松的农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”洛桑卓玛哽咽道。

1959年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西藏民主改革在当年的克松村拉开序幕，“西藏第一个农协”“西藏第一个农村党支部”相继在这里成立，农奴翻身做主人，开始了崭新生活。

如今，昔日农奴眼里的“人间地狱”已换了人间，宽阔的街道，雕梁画栋的藏式民居，步履匆匆却满脸祥和的居民，都展示着克松——这个民主改革最前沿村庄的巨变与希望。

血泪的控诉

走进西藏山南市乃东区克松社区的陈列馆，逼真还原的农奴居住的窝棚、寒光凛凛的刑具、阴森的囚笼等实物和场景，浓缩了封建农奴制时代农奴生活的情景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62年前的克松是旧西藏大奴隶主索康·旺青格勒的庄园。一个庄园，302个“会说话的工具”（农奴）每天承受着沉重的差役，成年累月地辛勤劳动，换来的却是衣不蔽体、食不果腹和狠辣毒打。

78岁的原克松村党支部书记索朗顿珠说，克松庄园里的残忍比挂在馆里的照片、实物要严重得多，那时农奴遭受的苦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，多得数不清！

1968年，克松人根据克松庄园真实发生的故事，自编自导了舞台剧《农

奴泪》，剧中赤列多吉一家被农奴主无情蹂躏的悲惨遭遇，把旧西藏的黑暗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“奴隶赤列多吉饥饿难耐，与狗抢食，被管家毒打。他奋起抗争，结果遭受酷刑而惨死。妻子嘎多精神失常，儿子达瓦和萨波伺机为父报仇，最终也被农奴主折磨致死……”这是《农奴泪》中的一段情节。

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这部家喻户晓的舞台剧在西藏多地演出，常常引得观众失声痛哭。

半个多世纪以来，《农奴泪》被一代代克松人搬上舞台，控诉着残酷的农奴制度下西藏人民的血泪。

伟大的变革

1959年3月28日，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命令，解散西藏地方政府，施行民主改革，彻底废除“政教合一”的封建农奴制。

此时，正在西南民族学院上学的丹巴见参主动要求回藏参加平息叛乱，投入到社会调查工作中。在克松，他深切感受到群众极端贫困的生活和高涨的反抗情绪。他在调查报告中这样写道：“克松的人民早已无法忍受农奴主的剥削和压迫，这里可以成为认识旧西藏农奴制本质的活教材，成为教育全西藏广大翻身农奴的基地……”

最终，中共西藏工委综合考虑了历史和现实的因素，决定在克松村进行民主改革试点。

1959年6月6日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克松村302名衣衫褴褛的农奴第一次举起双手，行使他们翻身作主的权利，选出西藏第一个农民协会筹委会。7月5日，农协正式成立，随后村民分得了祖祖辈辈盼望的土地。

当选农协主任的尼玛次仁，站在一张满是油泥的小桌上高声向群众讲

道：“乡亲们！过去，农奴主坐在桌子上面，把我们踩在下面。今天，共产党帮助我们解放了，我们从此站起来了！”

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，占当时总人口95%以上的农奴和奴隶从此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人身自由，第一次分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。

同年12月，西藏第一个农村基层党支部在克松村成立。尼玛次仁、白玛顿珠、索朗顿珠的父亲阿旺等5位村民成为首批党员。

在党支部和党员的带领下，克松人热情高涨地投入到生产建设中，他们种田地、修水渠、办夜校……终于做了这片土地的主人。

索朗顿珠见证了克松日新月异的变化，他回忆道：“克松的共产党员在各个历史时期始终走在群众的前面。”

20世纪80年代，克松利用距离城市较近的区位优势，发展起城郊型经济。农奴的后代土多买了村里的第一台东风卡车，成为村里第一个万元户；达瓦次仁开办了远近闻名的粉条厂，带动乡亲们共同增收，改革开放释放出高原农民的发展活力。

远大的前程

3月的雅鲁河谷，春回大地。

16日，克松社区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春耕盛典，200余名群众盛装出席。在一片欢呼雀跃中，16台农机发出隆隆的轰鸣声，依次向土地进发，平整的土地逐渐被犁出一道道深深的垄沟，播下了青稞种子。

“春耕在西藏农民的眼中，是一年之中最为隆重的农事活动。”73岁的多吉说，现在，农业机械化普及，农民再也不用亲自耕地了，外出务工人员越来越多，但每年春耕仪式还是能吸引很多人回来

参加。

2020年，克松社区采取群众自愿，把83.5亩土地流转给西藏自治区供销社下属企业，用来种植蔬菜。土地流转后，社区445名劳动力中七成外出务工。同时，土地流转费、田间劳务费和土地托管分红三项收入，让百姓得到了实惠。居民洛桑旺久家去年流转了6亩土地，有了空闲的他开始在市区跑出租，去年仅这项收入就达10多万元。

克松社区目前党员队伍发展到12个支部，168名党员，成为建设小康社会的坚强战斗堡垒。

“今年，我们准备再流转140亩地。”刚刚当选克松社区党委书记的刚组告诉记者，曾经被农民视为“命根子”的土地，如今变成乡村振兴的“活资产”。

从旧社会为奴隶主耕作，到改革开放后的土地承包，再到如今的土地流转，克松每一次的土地改革都释放了生产力，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国家在克松投资近4000万元，启动“生态文明小康示范点”建设，整修排水、照明、绿化系统，修建便民服务中心、农家书屋等，人居环境焕然一新。2017年，克松社区所有贫困户实现脱贫，2020年，社区人均年收入达到2.5万元，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实现新的飞跃。

“随着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克松准备发展旅游产业，利用交通便利、红色文化以及集体经济的优势，打造集餐饮、住宿、休闲为一体的田园旅游产业，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。”刚组踌躇满志。

就读于浙江大学的白玛德庆，对家乡巨大变化感慨万千：“克松这片红色的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我很骄傲。我也在积极申请入党，争取学成归来为家乡将来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。”（新华社拉萨3月19日电）



身着盛装的西藏山南市乃东区克松社区居民在进行春耕仪式(3月16日摄)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 摄



身着盛装的西藏山南市乃东区克松社区居民在进行春耕仪式(3月16日摄)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 摄



西藏山南市乃东区克松社区的居民领到分红(2月9日摄) 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 摄



由克松农民自编自演的话剧《农奴泪》在拉萨人民大会堂演出(2011年5月23日摄) 新华社记者 觉果 摄

河东巾帼英烈王光

张振华 王志英

王光，原名王联鑫，1920年3月17日生，家在盐湖区东城办大胡家巷13号。因家境贫寒，她5岁时就给安邑城一个财主家当丫头，受尽了千辛万苦。

1927年春，7岁的她鼓起勇气，从财主家跑了出来，被无儿无女的小职员王挺芳和妻子吕玉卿收养。不久，养父母将她送到运城女师附小读书。

1934年暑假，王联鑫又考入省立运城女子初级中学，班级是15班。班主任张吉辰思想进步，常常向学生介绍进步书刊，指导学生阅读进步作家的作品。受张吉辰影响，王光很早就参加了地下党。

王联鑫个子中上等，身体结实，爱好打球和演戏。上学期间，她曾多次到城内各街市和城外的原王庄、留驾庄、高家垣、王家营等村，演出抗日剧目。

1938年3月2日，日军逼近运城，18岁的王联鑫随同父母，跑到猗氏县罗村避难。罗村紧挨着孤峰山，我党领导的猗氏抗日政府和抗日宣传工作组就驻扎在此。一天，抗日宣传工

作团要在罗村开会，王联鑫早早来到会场。团长苏志乾问她时，她说：“我是运城女中的，你们还要不要人？”苏志乾说：“要，只要你愿意！”她回去后就说服父母，于1938年5月参加了抗日宣传工作组。

为了扩大抗日宣传工作组，王联鑫曾女扮男装，头戴帽，腰扎布带，上边斜插一根烟袋，到焦家营、罗村、东姚庄一带，寻找在那里避难的女中同学惠桂花和路云卿等，动员她们一起参加革命。

1938年冬天，党组织将王联鑫送到乡宁牺盟中心区党训班学习。期间，她改名王光。1939年6月，王光经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在长期革命斗争中，王光和革命同志苏志乾互相关心，互相帮助，结下深厚感情。1939年春，经党组织批

准，两人在稷王山南麓的南文村结了婚。

1939年冬，阎锡山发动“十二月事变”，党组织决定212旅撤到晋东南沁源。王光也于1940年初，随民运大队撤到那里，并到武乡县蟠龙镇参加了抗大总校学习。

抗大的生活十分艰苦，睡的是土炕，铺的是杂草，枕的是砖头，还经常到30公里以外背粮背菜，休息时还要上课。王光经受了这种考验，学习劲头更大。她学习了政治经济学、辩证唯物主义、游击战争等马列主义理论和军事知识，还参加了射击训练。她是新学员中唯一的女班长。毕业时，学校想留她在校工作，她却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。

1941年春，王光被分配做群众工作。她和10多个女同志一起，走乡串

户，刷写标语，进行抗日救国宣传，其爽朗的性格，吃苦耐劳的作风，和蔼可亲的品德，在群众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1942年秋天，党组织派王光到新开辟的冀县(现属安泽县)任一区副区长。期间，她积极发动群众减租减息，拥军优属，反奸清算，工作搞得轰轰烈烈。她还经常和妇女们一起做军鞋、纺棉花、织布、拉家常，妇女们有问题时，她就千方百计予以解决。

一区下面有个柳树沟村，一个女青年和附近村一个小伙子相爱，女方父母坚决反对，把女儿许配给了一个比她大20岁的男人，姑娘宁死不从。为此，王光多次到女方家作她父母工作，帮助女青年和那个比她大20岁的人解除了婚约，并安排她和她相爱的男青年领了结婚证。此事为当地妇女解放、婚姻自由开创了先河。

王光在处理个人利益和革命利益关系上，总是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。她和苏志乾结婚后，苏志乾在212旅旅部工作，王光却到抗大学习。后来，苏志乾到太岳三分区政治部，她又调到冀县，双方很少见面。组织上有意解决这个问题，王光却表示，共产党员应该以党的利益为重，任何时候都不能考虑个人私事。

1943年4月，日寇对太岳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。在反扫荡斗争中，王光带领群众转移。当时，她和东上寨的民兵在一起，都隐蔽好了，她却不放心，要再出去看看。

不料，就在她出去查看时，敌人发现了她。她为了掩护群众，向远离群众的方向跑去。群众脱险了，她却不幸落入了敌人手中。抓住王光后，日军威逼利诱，严刑

拷打，想从她口中得到有价值的情报，她却报以破口大骂。日军又采用软化手段，用牲口驮着她，从东上寨到三区杜村，又从杜村到四区康村，给她罐头吃，并以让她当伪妇会会长为诱饵劝降，王光不为所动，始终痛斥敌人。

敌人一无所获，恼羞成怒，把王光绑吊在康村庙前的一棵大树上，再次逼问她八路军藏在哪里，王光大义凛然：“他们都藏在我的心里！你们想知道吗？妄想！”并高呼：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“打败日本侵略者！”

日本鬼子气急败坏，惨无人道地将王光杀害。牺牲时，王光才23岁。王光为抗日战争献出了宝贵生命，鲜血洒在冀县的大地上，染红了沁水河水；革命群众面对王光的遗体，悲痛欲绝，泣不成声，把她安葬在冀县杜村村庄的北山脚下。

王光牺牲后，太岳三分区政治部发布通报予以表彰。1947年，太岳行署在冀县烈士陵园为王光建了纪念碑，上面刻下碑文：“冀县区长王光，身居女界，然在反扫荡中从未稍后，乃只身遇敌，因忠贞不移而遭剖腹。”